

# 面向世界的當代大陸文學

中國作協的上海國際討論會

特別報導

「作家不要靠外國人來對自己作品加以讚許或承認。……對外開放是個可喜的現象；可是對外乞求卻不能算件好事情。」

詹乃爾

□白杰明

十一月初中國作協在上海召開了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與會的漢學家和文學翻譯家來自二十個國家。他們在三天的正式討論會及會間的休息時間，與部分當代中國作家和評論家進行了廣泛、深入，甚至也可以說空前坦率和輕鬆的交流。會議召集人是作協副主席、文化部部長、知名作家王蒙。雖然舉辦這個活動的決定早在王蒙就任部長前已經通過了，但會議的奇特成績在相當程度是被視為王蒙的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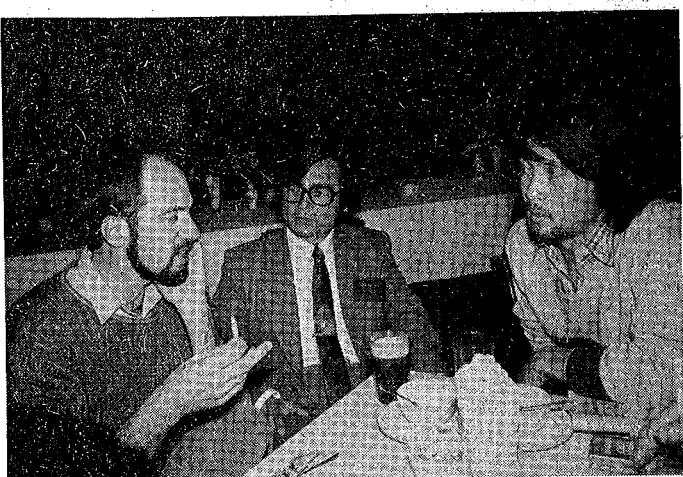
## 令人既迷惑又驚喜的會議

作協常務書記鮑昌在會議結束之際會表示，召開這次討論會主要有四個目的：一、促進中國文學對外介紹工作；二、給中國的作家、評論家和研究工作者提供一個聽取國外研究、評介中國當代文學的機會；三、加強國外漢學家之間的認識；四、創造一個幫助國外漢學家和中國方面（估計除了作家和評論家之外，亦包括官方）交換關於中國當代文學各自看法和意見的環境和條件。總而言之，舉行這個會是為了促進了解，交換信息，並在求同存異的大前提下進行交流。

## 「一小撮北歐老頭」

來開會的學者有像李歐梵、周策縱、林培瑞、

作協本來已經估計好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要授予一個中國作家；也有一個看法說，舉行這個會是為了引起國際注視並促使中國在今後數年獲取文學獎的可能性。分析和解釋眾多，莫衷一是。作為參加這個會的「代表」（與會者都發代表證一張，唯西方學者中無人知道除了自己還能「代表」誰），我倒認為上述種種看法，包括鮑昌的套話大概能夠成立。有這些「多元化」的解釋也恰好意味着中國文學走向多元化的總趨勢。



▲(左起)本文作者與少數民族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哈薩克族)及扎西達娃(藏族)。

Dars (《水滸傳》譯者)，德國著名的漢學活動家如André Levy (《金瓶梅》的譯者)和Jacques馬浩文諸位美國漢學家，有法國的幾位出色翻譯家馬漢茂，英國學者詹乃爾以及蘇聯的幾位著名漢學家 (包括前外交副部長 Fedorenko 在內)亦來到闊別了幾十年的中國)。但是，與會者當中有一位最吸引中國文學界諸君視線的學者，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研究所教授、瑞典皇家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 (Goran Malmqvist)。

馬在十月中旬訪台期間會接受《聯合報》記者訪問，其後該文並轉載於大陸的《參政消息》。內容不外是中國作家何時能獲諾貝爾文學獎，因此該文

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馬首先說：「假如〔沈從文〕的作品在三、四

期」作家沒有獲得國際文學獎的原因，純粹是由於外文翻譯不夠好。他們並沒有注意到一個「冷酷的

諾貝爾獎評審委員就無知到漠視了魯迅的成就；而這種忽視有損他們的形象，而不是魯迅的形象。一

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馬首先說：「假如〔沈從文〕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就被譯成外文，他很可能那個時候就會得獎。」

可是，首先翻譯本身必須是非常精彩的，否則外國讀者從何鑑定？同樣，我相信魯迅的《呐喊》、《彷徨》若在二、三十年代就譯成了外文，也應該是一位極有希望的候選人。其他的像老舍和聞一多，

假如也有優秀的翻譯，很可能早就得獎了。……我

認為優秀的翻譯還是最重要的因素。」緊接着他舉

例說，像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家》英譯本，

「簡直是謀殺文學，甚至可以說令人反胃。」以及外

文局英譯季刊《中國文學》「一般而言：譯文既不

稱職，也不是文學。」不過，馬氏還算較為樂觀：

「在翻譯高手越來越多的時候，中國文學就不會這樣被忽畧，情況自然會改善。」馬氏本身正在竭力

翻譯沈從文的作品；他剛剛完成了《邊城》的瑞典

譯文；緊接預備翻譯《長河》。近年來，他另有翻

譯北島、顧城、江河、楊煉、嚴力等「朦胧詩人」

的作品。

這個訪問記很快在大陸渴望着國際上的稱讚和承認的作家當中流傳開了，也立刻產生了一種滑稽的誤會：相當一部分自命不凡的人確實以為「新時

期」作家沒有獲得國際文學獎的原因，純粹是由於外文翻譯不夠好。他們並沒有注意到一個「冷酷的事實」，馬悅然談及的作家，包括已封筆將近四十

年的沈從文，都是現代文學作家，而並非當代文豪。

在討論會上，馬悅然沒有宣讀他準備好的發言

稿，而企圖在他發言時間澄清外界的種種誤傳和

猜測。在座的恰好有馬氏所抨擊的《家》英譯版譯者，即長住北京的老美國專家（其實他早已入中國籍）沙博理，另有《中國文學》的前任總編輯、著

力圖反駁馬悅然的觀點，但他義憤有餘，道理卻不足，因而除了引起少數人的同情外，並沒有說服其

他西方學者。馬倒在發言時特地指出他對《中國文學》的批評，並不包括楊憲益夫婦。在他發言後有幾分鐘的冷場，然後鄧友梅（作協外聯處處長）談

了一些貌似客氣，實則很尖銳的意見。他尤其指責

馬悅然這種文化交流的橋樑應當保持暢通無阻，而不應當過分地限制交通。（言外之意也許在批評馬

對朦胧詩的過多的注視。惜乎討論會的這部分正式

錄音材料，即關於馬發言的爭議，包括新加坡的馬

潤華和蘇聯的前外交官譏諷皇家院士的言辭，由於

莫名其妙的原因，全然沒有錄音，因此不能在此引用。）

在鄧發言後，英國學者和翻譯家詹乃爾（W.

J. F. Jenner）發表了一篇極精彩的言辭，博得了這一小撮北歐老頭的承認並不能證明中國文學的

成就，而僅僅代表他們自身小心翼翼的想法。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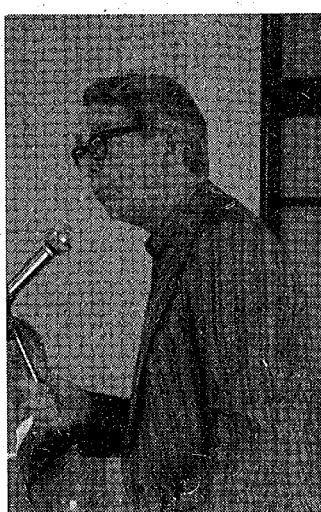
諾貝爾獎評審委員就無知到漠視了魯迅的成就；而這種忽視有損他們的形象，而不是魯迅的形象。一九三五年魯迅創作巔峯時期，諾評審會則根本沒有發獎予任何作家！反正，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當中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人被淘汰。企圖利用所謂的客觀標準來衡量世界上的作家壓根兒是不可能的。

「一旦中國作家獲得了諾獎，我也會拍手稱快。這並不是因為這個獎會為中國文學增光，而僅僅是因為我會替那個得獎的中國人感到高興：他

是根據詹乃爾先生的回憶記錄整理的。」

詹氏在他正式的發言中（他請了張辛欣宣讀）

還有不少高見：如「對外開放是個可喜的現象；可是對外乞求卻不能算件好事情。」以及他的「三不要精神」：即中國作家「一、不要給大人寫少年兒童文學；二、不要躲避人生中最基本而無法解決的問題（如死亡等）；三、不要恢復、發揚阿Q精神，不要給任何當代阿Q以精神安慰。」但在喝采和掌聲背後，我們與會的外國人時常看到了中國方面的某些代表和工作人員對馬悅然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化下很大的功夫。嗚呼，阿Q仍然健在！



▲備受注目的馬悅然。

在鄧友梅的發言後，英國學者和翻譯家詹乃爾（W. J. F. Jenner）發表了一篇極精彩的言辭，博得了這一小撮北歐老頭的承認並不能證明中國文學的成就，而僅僅代表他們自身小心翼翼的想法。早期

晚有一天，某位中國作家會得到諾貝爾獎。但得到了這一小撮北歐老頭的承認並不能證明中國文學的

成就，而僅僅代表他們自身小心翼翼的想法。早期

## 漢學家的厚望：要忠於自己

詹乃爾發言數次，常常語驚四座，頗受歡迎。他後來在正式發言中就當代中國大陸文學的一些較

令人感到遺憾的現象，發表了精闢的看法（以他自己的話來講屬「痴人說夢」）。「首先，『痴人』要說的第一個夢是中國作家會先重質量，後重數量。在今後幾年中，應設法鼓勵作家，特別是有才氣的作家，別盡想着『多產』，而應集中精力搞些『傳世之作』。換句話說，該多重寫、改寫，編輯能多騰出時間與作家共同改稿，少出版點東西。現在外國人看中國作品的一個共同感想是：如果這作品能刪掉幾分不是更好嗎？」

他強調文學多樣化的重要性。他稱讚大陸先鋒派作家，但不無個人性質的保留。他說，「我在這兒為敢於創新的作家搖旗吶喊，希望他們能夠成功！」

至於我自己呢，更重要的是想早日聽到帶有作者個性的心聲。……我覺得，中國作家之中還是一種普遍傾向，經常不得不擺出一副與己無關的架式來，而廣大讀者卻因此而享受不到讀書中應有的樂趣。只有那些將自我揉進作品之中的作家，才會跟讀者的心靈相通。當然，這包括的不是那些故作姿態的人，而是真正敢於面對現實的作家。所以曹雪芹、魯迅、莊周，即使在外國讀者眼中，也是以一個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個人出現的。同樣也是像蕭紅這類作家能夠引起直接反響的原因。劉賓雁的最好的作品的可貴，也恰好是因為裏面實實在地體現了自己。」

他還呼籲：「中國作家們，請不要為了外國人而寫作，即使這樣做，短期內或許能在國外賣掉一些書，可是你卻因而背叛了自己的真正讀者，並由此陷入一味迎合外國人對異國情調的片面追求而終究喪失了自己對真實的追求。」

詹乃爾和相當一部分其他外國與會者，都表述了自己對中國文學的較為深沉的看法，而從不同的

視角對當代大陸作家進行了批評。其中李歐梵談論

近期文學的語言問題及其重要性（見本刊第十一期）；法國著名翻譯家譚儂容（Jacques Dars）就和中國問題專家白霞（Jean-Philippe Beja）就

創作自由和黨政關係發言；筆者亦評論了近十年來的散文創作（見本刊十一月號）。這些發言都包含了不少中國文化當局難以接受的論點，不過這個會議鼓勵各述己見，並允許公開討論和爭議（除了筆者論文外，其他有「怪異」內容的論文都有討論時間）。內地的記者在會議期間非常活躍，勤於採訪持有各種不同看法的漢學家。據說，他們跟作協的某些力圖保持嚴肅學術氣氛的幹事發生了衝突。

儘管有些這類的不快，外國的與會者都十分樂意為中國新聞界所注視（甚至受寵若驚）。在開會期間及會後，內地的報紙有不少反映此會的「奇談怪論」的報導。這些努力本身不僅僅是由於文化當局的一種鼓勵友好、團結學者的簡單模式而產生，而是表明在同外界接觸中，中國文藝界也趨向成熟。以往的疑神疑鬼，把漢學家視為特務和破壞分子的姿態，終於消失了。

## 主人家禮尚往來

中國作家代表（主要的有：劉賓雁、白樺、汪曾祺、陸文夫、張辛欣、王安憶、舒婷、張亞、柯靈、流沙河、高曉聲、蔣子龍、從維熙、孔西達

娃、王蒙、鄧友梅、茹志鶴等）發言裏頭也不無精彩的內容。尤其劉賓雁的發言備受歡迎。劉的發言遠遠超出了大會規定的十五分鐘，並一再有漢學家提議減少自己的發言時間以便讓他繼續講話。白樺在發言中雖然沒有什麼新意，但他所談的主題「文學和作家的尊嚴」，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像王安憶、舒婷和張羊欣這三位代表年輕作家的女士，發言卻無新意，並在相當程度上缺乏她們作品的那種吸引人的基素。

中國方面出席會議的評論家的發言都相當分量。如謝永旺談近十年的文學論爭、鮑昌回顧小說

的發展情況、謝冕談論詩的和平的騷動」、樂黛雲的發言《我觀中國當代文學》，都給國外漢學家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一個缺憾是本來要參加這次會議的劉再復「因事未出席」。另有一位頗受到

部分漢學家重視的作家張賢亮，據悉「因為買不到飛機票」而缺席了，這令兩位熱衷於研究張著的女

學者大失所望。並且，雖然劉賓雁和筆者均言及北京青年評論家劉曉波震撼文壇的觀點（賓雁十分欣賞其「政治陽萎」的觀點），但在討論中幾乎沒有人

做延續性的發言。國內的評論家，除了樂黛雲有部分想法近似劉曉波，也基本上致力於為「新時期」唱讚歌。不過，在第一次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大家

能暢所欲言已經是一件非常值得慶幸的事情，這種會本來很難准許太深刻的交往，其宗旨是在接觸，並在接觸和交流間消除誤會促進認識。在這個層次

上，這次會議堪稱圓滿。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講，這種會議在創造中外作家、評論家和翻譯家較長時間接觸的條件，也許也提供了產生新的誤解和爭議的事端。若是這樣，估計今後還會有機會「在矛盾當中前進」吧！

## 期待進一步的開放

這次會議有一件鮮為人知但值得一提的「内幕」。作協在組織會議期間打破了中共長達十二年的禁區，給僑居澳洲的著名漢學家和作家李克曼

（Simon Leys）發出邀請。可惜李由於客觀條件

無法接觸大陸的現實生活，覺得自己無從討論當代文學，因而決定不出席。但在總的遺憾背後，有一

會議的動機，仍有各種各樣的估計和分析。不過，在大多數與會的外國漢學家當中，卻有一個共同的感

「新時期」文藝界以及政治界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

人物。但願比王蒙更高級別的中共決策者，能夠看

自己對中國文學的較為深沉的看法，而從不同的

文學和作家的尊嚴」——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Simon Lewis 發出邀請。可惜由於客觀條件

無法接觸大陸的現實生活，覺得自己無從討論當代文學，因而決定不出席。但在總的遺憾背後，有一種安慰之感，那就是中國文化當局給他發出邀請這一舉動，本身表明了他們有人終於承認了他對西方世界了解中國所做的貢獻。但與此同時，戴厚英和王若望這兩位深受海外漢學家尊重的上海作家，僅僅在會議前後的招待會上露面一事，則令人感到疑惑。也許上海作協認為這兩位作家不具備足夠的「代表性」。

至於中國作家協會決議舉辦這個破天荒的國際

會議的動機，仍有各種各樣的估計和分析。不過，在大多數與會的外國漢學家當中，卻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這個會議開得比他們預期的更隨便和熱烈。安

排和主持這樣一個大規模的會議，作協做了很多普遍獲得各界人士讚賞的努力，並證明了中國作家協會本身在面向世界、對外開放上已經克服了往年瀰漫中國文化界的那種狹隘偏激和傲慢。王蒙作為作協的一個負責人、文化部的部長和一個在「新時期」文學的歷史上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的作家，巧妙地處理了衆多複雜且棘手的問題，並又一次表明了他是

## 劉賓雁講的四個故事

博聞小撮

### • 集 聞

在中國作協舉辦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劉賓雁是備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在研討會上，指出現實政治和生活中仍有十多個被文學「遺忘的角落」。他講了幾個頗為發人深省的故事。

過去，這完全是生活中的「禁區」，絕對不能談，也不能寫。但，這難道是小問題嗎？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人的基本需要如何被蔑視和摧殘。劉賓雁說，他最近到過哈爾濱，那裏的一個醫院剛開始男性的機能問題的治療。他碰到一些男青年，正在談戀愛，快要結婚了，才發現原來自己不靈。過去，這個問題不能碰。有這種毛病的，不能對別人說，也不能對女朋友說，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殺。現在哈爾濱才剛出現一兩個醫生治這個病，據說是中國第一個，而治這個病其實並不困難。在那裏，還有駭人聽聞的事，就是有好幾個婦女，五十多歲了，結婚三十多年，這一生也即將完結了，才被發現還是處女。她們一直以為自己有病，所以不能懷孕。這是多殘酷的事。

●第二個故事是蘇曉康寫的一篇《洪荒啓示錄》，是關於河南省一九七五年一次很大的水災。水災十年後，作者到了那個地方，看到那裏的人用

「新時期」文藝界以及政治界的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願比王蒙更高級別的中共決策者，能夠看到中國大陸的文化跟經濟一樣，會隨着對外開放的政策的實施，有可能與全球各國的八十年代文化一般，既有地域性又有能夠與任何地方的人溝通的共性。中國再也不是文化沙漠，它的文化再也不是一個圍牆以內的文化。希望下一次那些「賢內助」企圖「清污」或抵制「自由化」時，他們首先考慮到文藝界和民衆的利益，再而考慮到「國際社會效果」。

的桌椅都是泥做的，搬家很容易，因為都搬不動，救災款大量被貪官污吏侵吞了。有個人好心到那裏去辦了個工廠，解決了一些就業問題，結果被當地的土皇帝刁難、勒索，最後被擠垮了，人們勸他不要洩氣，舉辦第二個工廠，但還是被擠了。對這件事，新華社有個記者王彪為了寫個內參，曾經被打得頭破血流。不過最後結果還是好的，出了蘇曉康這個《洪荒啓示錄》。

●還有一個是登在新一期《報告文學》上面的，事件發生在上海，一家問題不算嚴重的大學。因為有個女教師要跟外國人結婚，校領導就出來反對，他認為中國人不能跟外國人結婚——太丟人了，尤其是中國女人嫁給外國人；中國男人娶外國女人那不同一點，好像可以佔點便宜。就這樣，把那教師整得死去活來，差點死掉，到現在還受壓迫。這教師本來是上海市勞動模範、優秀教師，非常老實的一個人，已經老實到有點窩囊的程度了。就因為她加入了共產黨，所以不許和外國人結婚，作為黨的任務。而且是黨內機密，不許洩露。這是前年夏天的事。